

# 民族精神在臺灣

王成聖

## ——蔣著「台海風雲人物」評介

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史學家蔣君章先生新著「台海風雲人物」，是一本發揚民族精神的巨構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民族精神，早已成爲普遍而流行的名詞。但是民族精神到底包括些什麼內容？言之者少，作者末學，竊欲於此作一初步的說明。

我國傳統的民族精神，始於春秋的嚴夷夏之辨。孟子曾經作過簡單的解釋，他說：「夷狄之進於諸夏者，諸夏之；諸夏之進於夷狄者，夷狄之。」從這一解釋來看，在古聖先賢的目光中，諸夏與夷狄相對立，諸夏代表較高級的文化，夷狄的文化則是較落後的。由此可知保有高級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生活，便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目標，孔子對管仲尊周室攘夷狄，特予贊佩。孔子說：「微管仲，吾其披髮左衽矣」，披髮左衽，是文化程度較低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一。這是我國傳統的民族精神重點之所在。

從我國歷史的發展來看，我們的民族精神，實不限於保有較高級的文明生活，似乎還有更積極的其他方面。例如，周初以宗法社會爲骨幹而組織武裝的宗族集團，以分封諸侯來推行農墾，披荆斬棘，筚路藍縷，黃河流域的中下游以及河北山西乃至於長江中下游的農業化之完成，全

是這樣來的。這種開闢草萊之地的精神，實爲我民族精神積極面的重要部門，我們不妨稱之爲冒險犯難的創業精神。中國領土的擴展，便是這種創業精神的結果。約言之，我們的祖先，把農業推廣到各個地區，由於農業收益大於漁獵與畜牧，所以凡能推廣農業的地區，居民看見了這種新的生產事業的利益之高，乃羣起仿效，從而改變其生產方式；經過長時期的生產方式之改變，便在不不知不覺間接受了農業民族其他生活方式，融化的爲中華民族的一分子；而其所居之地，即爲中華民族所建的政府之領土的一部分。這是「用夏變夷」的積極的民族精神。

反之，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落後的所謂夷狄，這些宗族進住於中原地區後，由於農業生產利潤之高，受農業地區文明生活方式之誘導，乃從生產方式開始，接受農業民族定居的和農耕的作業，成爲有姓的夷狄，他們接受了農業地區的生活方式，無意間也成爲諸夏民族的一分子。這是「用夏變夷」的積極的民族精神之另一部分。

中國自南北朝前後，五胡亂華，以迄於宋元明清之季，積極的民族精神在亂離之世所表現的，除苦戰死義的忠烈之士另當別論外，其餘略可分爲兩方面：一是採取義不帝秦的堅強態度，誓

不與胡人兩立，先民扶老攜幼離開家鄉，向南奔避，結果成爲閩南、嶺南、嶺東的繼續開闢；其或中國無託足之地，則遠避海外，在另一天地中傳播中國的教化，表示其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；一是在無法可以遷徙的環境下，他們逆來順受，在胡人勢力圈內，過獨善其身的生活。他們又可分爲兩派：一派是徹底不與胡人合作，看到百姓學胡語或胡人音樂等，便採取嘲笑蔑視的態度，甚至著書立說嚴以譏刺，以垂範於其後人，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，便充滿了這種精神。另一派，在對胡人政權逐漸穩定時，與之共事，改良其政術、治術，使其逐漸華化，如盧淵、盧辯等，卒使胡人漢化，漢人復獲政權。這些民族精神的積極面，其中都含有堅忍不拔的道德原則，殊堪欽敬，而他們對於國家民族所作的貢獻，都是同樣的崇高，那種漸與胡人合作，對胡人潛移默化的功效，恢復了民族的統治權，表面上他們似已屈服於胡人政權，但是實際上他們是忍辱負重的在進行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工作，其最後目標，仍在於胡人政權之瓦解與漢人政權之恢復，這種精神，尤其值得我們稱道。

嶺南嶺東人民，都是先民義不帝秦而南來的民族精英，宋明末年的抵抗最力，便是傳統的民

族精神之具體表現。台灣居民的祖先，大多數來自閩南與粵東，其血液中間多保衛民族生存的精隨。他們有冒險犯難的創業精神，更不惜犧牲保衛民族的志節。自延平郡王鄭成功率師渡台以後，更把這種精神發揮到最高峯。及鄭氏不祚，其遺下的秘密社會組織天地會發展到大陸與東南亞以及海外各地，繼續致力於反清復明的運動，大陸的一清和尙案、天理教案以及後來的太平天國反清運動，都和天地會有關。鄭氏雖亡，但是台灣的天地會始終致力於反清運動，所謂朱一貴之亂、林爽文之亂等，也都是天地會分子所策動。清政府因有台灣三年一小亂，五年一大亂之評語，此無他，民族精神為之中樞也。及甲午一戰，清師挫敗，遂割台澎以和，台灣知識分子在反對未成之後，即以實力宣布拒絕日本接收，組織民主



臺海風雲人物一書著者蔣君章教授近影。

共和國以抗日師。其時的民族精神，實蒙雙重的創傷。在民族精神的立場，滿清統治中國，是要反抗的；但是滿族還是我們自己的同胞，不過比較落後而已；而日本卻完全為異族，故轉變其復明的宗旨而為「永清」（民主國的年號），誓與日軍之統治台灣周旋到底。台北失守，日軍尚未南下之時，即有莊大北之襲擊台北。其後台南淪陷，民主國覆亡，有形的抵抗雖告終止；但是同胞的反日運動，始終堅持不懈，其義師仍是三年一小起義，五年一大起義，直到日本退出台灣為止。試看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台灣以後，同胞即協力同心，與海內外同胞團結一致，共同努力於保衛我國文化和光復大陸為我們共同的目標。這一事實，證明了清人所謂台民「好亂」之無稽，台民之所以「亂」，是為了民族精神的重振，故國山河的光復而已。

因此，中國民族精神，在台灣所表現者最為具體而最具模範性，鄭氏來台以前之閩粵人來台，創業的民族精神也；郭懷一抵抗荷蘭人之壓迫，抗暴的民族精神也。鄭氏復台，則兼具創業與復興祖國的民族精神，而無理滿清政府脅迫其父所作之招降書，以致在大陸的全家都被滿清政府殺害，這是移孝作忠的極致。沈葆楨稱為「創格完人」，康熙帝不廢其祀，而以「明之忠臣，非朕之亂臣賊子」解釋之，乃知延平郡王之民族精神，雖敵對的當時異族帝王也予以適當的尊

重。我們遍讀台灣歷史，割台以後之抗日自主實可與鄭成功反清復明精神先後媲美。當時的志士先烈，以台灣彈丸之地，數十營新集之兵而義不降日，奮起抵抗，死而後已，是丘逢甲、劉永福、鄭成功的民族大節，直可與日月爭光，又何必讓於延平郡王？民國初立，祖國之統一未固，兵力未強，而羅福星間關返台，部署革命，雖其志未伸，而臨難不屈，其精神誠足以驚天地泣鬼神。余清芳抗日義舉亦同於羅福星。昔人有言：「知其不可而為」，丘、劉、羅、余諸先烈實有之。知其可為而為者，是為現在；知其不可為而為者，是為將來。丘、劉、羅、余諸公的奮起抗日，是為將來千千萬萬的丘、劉、羅、余致力於抗日救國，此乃台灣終於重回祖國懷抱的基本因素。今天以台灣為復興基地，是知其可為而為的時代，正是萬眾一心，全力光復大陸為民族精神寫下更光輝史頁的大關大節，更是鄭成功精神與丘、劉、羅、余精神更積極的表現。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年來積極提倡台灣民族精神的表揚，可謂光復祖國河山的要領。

蔣君章教授適於此際完成其「台海風雲人物」一書，凡四章，二十餘萬言，對丘逢甲、劉永福、羅福星、余清芳四位抗日民族英雄艱苦卓絕之奮鬥經過，予以詳盡的評述，讀此書，而對光復祖國河山不盡其最大努力者，殆不可稱之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筆者深願國人擷取丘、羅、劉、余諸先烈先賢的奮鬥精神，踏著先賢先烈的正道，勇往直前，格外努力於復國建國之大業，則蔣教授此作，自非浪費筆墨了。